

21 世纪与历史教育

§ 1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进入 21 世纪。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展望历史学科和历史教育的发展趋势，首先要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趋势。历史学，作为一门连接过去、现实与未来的综合性知识学科，它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在人们观念形态和知识系统中的反映。历史教育，作为历史知识世代传承和人类集体记忆延续光大的主要载体，它比其他学科的教育更重视从总体上理解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而另一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教育的理念及其目标和功能的向度。

进入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其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是由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运动奠定的，而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运动又是人类社会和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对当代社会的认识不可能脱离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运动的总体认识，尤其是以“世界历史”为中心概念的理论坐标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线索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是纵向的发展，主要指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轴，人类社会由文明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迄今已发生过两次大的文明转型，即从原始的采集、游猎文明向农业、游牧文明的嬗变；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飞跃。目前，正在继续向更高级的后工业的新型文明演化。虽然在进入工业社会前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文明形态表现不一，各自的发展路径别具特色，但在多样性中仍然展现了人类文明由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简单生产方式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复杂生产方式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诸文明区域之间生产方式的共性特征。这些在相对孤立的发展条件下形成的文明的共性，一方面反映了人类作为生物种群的统一性和作为社会种群在行为方式上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在地域性文明时期人类整体性发展的基因已经存在，这就为后来工业文明的全球性扩展提供了前提。

二是横向的发展，主要指文明间的接触、交流、融合和主流文明的扩展。人类社会的早期文明呈点状分布，在各个原始民族的群落独立地发展，以后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共同体结构的扩大，高度分散的文明点逐渐聚合为较大范围的文明区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既缺乏远距离沟通的技术手段，也缺乏外向型发展的驱动力，所以文明的横向扩展是有限的。诸文明区域间的接触和交流主要发生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欧亚大陆和北非，主要形式是互通有无的贸易和由商人、宗教使者、探险家推动的文化交流，而历史上通过军事征战一度建立的跨地域大帝国（如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区域间文明的交流。但总体来看，各个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基本上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路线平行地发展，地域性特征相当明显。至于有些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和澳洲，因为有沙漠、大洋的阻隔，更是处在与其他地区基本隔绝或完全隔绝的状态，文明发展的孤立性更为突出。一直到 15 世纪末，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受到纵向发展程度的严重制约，地域性历史的格局

没有根本的变化。

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跨越是横向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这一具有根本性转折意义的突破是与纵向发展进程中文明形态的重大飞跃——工业文明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受土地束缚的自然经济形态，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工业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巨大可能性，也强烈地刺激了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这一社会发展机制上的革命性变化带动了全方位的社会形态的变革，人类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 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西欧。16—18 世纪的 200 年间，西欧地区的科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接踵而至，在英法等国首先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原型。此后，就开始了工业文明向全球的扩展。到 19 世纪末 形成了世界历史的第一种结构形态——欧洲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个辐射世界的经济体，即欧洲国家运作的世界市场，但它的全球性又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未获得进入世界体系的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16—19 世纪的世界史还只是世界历史的初级阶段。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已经在工业文明的扩展中启动，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还不高，世界体系的早期形态还延续着传统的帝国式政治结构，欧洲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还未能展开自主的现代化进程，所以，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整体性运动尚处在较低的水平，很多国家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依然滑行在传统社会的轨道上。

20 世纪，在迄今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充分地展示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历史运动。这一百年间，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决定性地超越了区域性发展阶段，工业文明的全球普及和现代社会发展机制的全球扩散最终把世界各个区域联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在经济力量的驱动下，在伴随着种种矛盾

和冲突的历史进程中，进入了全球性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新阶段。

从区域现代化向全球现代化的推进，是工业生产力主导下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实现，主要是由于 20 世纪的历史运动创造了有利于“全球化”的基本历史条件。

20 世纪是科学技术不断取得革命性突破的时代，由此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如果说，16—18 世纪先后发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地球上的一个区域启动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那么，20 世纪初以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创立为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及其推动下的持续的技术革命（尤其是 20 世纪中后期在能源、信息、材料、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等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通过充分释放工业生产力的潜能，使工业文明的扩展获得了从根本上突破自然区域障碍的强大技术支撑。在现代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条件下，居住在地球各区域的人们已不再受自然的、时空间隔的束缚，全球性的人员、资金、物资流动和信息沟通成为现代化世界进程进入全球化阶段的重要特征。

20 世纪也是世界体系经历裂变和重组，向全球统一世界市场过渡的时代，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结构。世界历史的发生、发展与世界体系（首先是经济体系）的建构表现为同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约从 500 年前即已开始。但是，在 16—19 世纪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初级形态还不具有充分的世界性，现代化的区域性严重地限制着世界体系的结构特性。那种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在进入 20 世纪后因内外矛盾的激化而发生剧烈动荡和裂变。以战争与革命为基本特征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世界主导力量的转移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整合准备了条件。但是，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延缓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结构影响下，世界体系一度表现出二元特性。实际上，这种二元性所反映的仍

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过渡性。作为世界体系基础的世界市场的本质是由经济运动的客观趋向决定的，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和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冷战。冷战后，世界市场的全球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世界体系的发展所提供的结构性要素与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技术性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深刻根源。

总之，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纵向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横向发展的程度，横向发展的突破又反作用于纵向发展，使纵向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人类文明由此发展到今天的高度。20世纪末的世界相当清晰地凸现了人类历史的“世界性”，即整体性发展，也充分地展示了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在全球范围的结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20世纪基本完成了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以上所述是我们站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认识。在这一认识前提下，我们可以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

概而言之，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变动将塑造21世纪世界历史的新格局。

首先，以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世界历史运动正在将人类文明的进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一以超越工业文明为本质特征的文明进化的新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显示，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和托夫勒1980年发表的《第三次浪潮》对这种新趋势作了未来学意义上的预测和分析。到90年代中期，人们对这种新趋势的认识已经上升到形成普遍性概念的层次，一些表达人们共识的概念被作为新文明

的核心概念得以确立。其中，“新经济”、“高技术经济”和“知识经济”是目前人们在把握新文明基础性要素时最常用的三个概念。“新经济”最初是美国经济学界和新闻媒体对 80 年代以来经过结构调整而在 90 年代出现低通胀和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运行特征的概括。^{〔1〕}由于这一概念强调了一种在美国率先形成的、以网络信息技术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新型经济结构在改变传统的工业经济运行周期方面的功能，因此，后来被用于泛指由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的、依托全球信息网络的新型经济形态，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则被看做“新经济”的风向标。但是，“新经济”的涵义因其宽泛度较大而显得模糊，学术界至今没有明确界定，同时人们也意识到，“新经济”从整体上取代“旧经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在现阶段还不宜夸大“新经济”的基础作用。至于对文明发展新趋势的表述，选择内涵比较清晰、比较容易界定的概念更为合适。如，从产业结构进化的角度看，信息技术带动的高技术产业群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制造业而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在这个意义上，“高技术经济”可以作为新型文明发展的一个基础性要素概念。同样，如果从资源结构、资本结构和经济驱动力变化的角度考察，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形成。1990 年联合国研究机构首次提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概念，1996 年经合组织对这一概念作了明确定义，此后各国政要、学界和新闻媒体纷纷把“知识经济”作为新世纪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加以宣传，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文明发展趋势的关注。可以预期，随着新型经济和新型文明特征的进一步显露，表述其本质的概念也会进一步明确和清晰。但无论运用何种概念，可以确定的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正在形成中，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正在发生重大的、深刻的变化，这已经不是纯理论的预测，而是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正如 18 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21 世纪的世界也将迎来一个新型文明的时期。

其次，在文明进化的导引下人类社会正在全面展开多层次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在一般意义上是指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特定意义

上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即“现代化”进程。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是一个不平衡的、由点到面逐步扩展的进程，因而形成了多层次的社会转型重叠交织的局面。如果说在 16 世纪—20 世纪中叶，现代化的推进与工业文明的扩展表现为同一个过程，其间的层次性属于同一个向度的递进关系；那么到了 20 世纪后期，随着现代文明的升级趋势日益明显，现代化的层次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为：1. 纵向差异扩大。由于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领先的欧美发达国家拥有文明创新的最有利条件，所以当科学技术革命提供了突破工业文明的手段时，他们再次获得了发展的先机，从而占据了新的发展高度，拉开了与那些目前仍在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努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现在，现代化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工业化领域而且越来越多地表现在“高技术”或“知识经济”领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数字化鸿沟”。在这个发展空间被不断拉大、发展目标被持续提升的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的现代化压力，如果他们不能进入新型的经济结构，那么在传统工业结构中的绝对进步也将被整体结构的相对退步而抵消。所以 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言 现代化的含义是不相同的 但是 无论哪一类国家 都必须以文明发展的最高层次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并以此引导社会各个层面的持续转型，否则势必成为现代化竞争的落伍者。 2. 横向渗透加深。在现代化水平高低端距离拉开的同时，原先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间的梯度却趋向模糊，这主要因为现代文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已经使最先进的文明要素得以最快的速度普及到世界各个区域，从而使那些整体结构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能接触到先进的文明因子，并作为全球生产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局部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水平较高的产业。这种横向渗透固然服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主导的资本利益，而且不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整体性落后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疑提供了加快社会转型、缩短与先进国家差距的机遇。所以，层次间梯度的模糊也意味着国家间地位变动的可能性增加和变动频度的加快。同时，先进

文明要素的流动和普及还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社会转型的现代化程度，加速淘汰前现代的社会体制因素。总之，新文明导引下的社会转型既是多层次的 又是全方位的 它将使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总体上呈现出现代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持续发展的局面。

再次，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因为是在进入全球现代化阶段而产生或深化的 所以被称作“全球问题”被看做对全人类的挑战。

其一，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重构推动着国际政治秩序的结构重组。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大转型期，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单极霸权的强化构成新的世界性矛盾。20 世纪 90 年代是世界向新格局过渡的起始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新旧矛盾并发、诸种力量竞相争夺新格局的主导权。在此过程中，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意图与世界朝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形成尖锐矛盾。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展示了转型期世界主要矛盾的演化。显然，美国和西方联盟的战略及其实践对冷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从海湾战争开始 经过 10 年左右的动荡、调整，至科索沃战争，新格局的轮廓构架已露出端倪，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霸权在其中的作用表现得相当明显。然而，冷战后的世界毕竟不可能变成美国所希望的单极世界，因为在美国霸权提升的同时，发端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也在继续发展，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国）都不希望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支配力量，所以，多极化必然成为表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意志的世界性潮流，这股潮流是美国无法阻挡的。当然，冷战后新格局基础上的多极化与两极格局基础上的多极化，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冷战时期多极化趋势的主要作用表现在通过对美苏两霸的抑制促进两极格局的瓦解，那么，冷战后多极化趋势的功能主要表现在阻止单极霸权的形成，为一个更具合理性的、力量分布更为平衡的世界新格局提供建设性力量。但是，多极化趋势本身也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它与

全球化趋势的互动将对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秩序带来重大影响。

其二，发展的自然性结构失衡问题日趋突出。人类文明是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发生和发展的，系统的平衡是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代以来，工业文明首先在地球的某些区域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然后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展，失衡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到 20 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最终使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所谓自然性结构失衡，主要是指人类出于经济目的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后果超出了自然界自身的正常代谢功能，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紊乱和退化。目前，人们所观察到和意识到的这方面的突出问题是：1. 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和城市化、老龄化程度过高；2. 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3.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和人类的自然生存质量下降。1999 年 10 月世界人口突破 60 亿，人类在 40 年里使人口数量增加了 1 倍，而世界人口从 19 世纪初的 10 亿增长到 1960 年的 30 亿则用了 150 年。可见人口的增长呈明显的几何速率，如果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长，那么 50 年后的世界人口很可能超过 120 亿。人口的膨胀将使地球的承载能力面临极限，许多人类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将会枯竭。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2000 年全球环境展望》提供的数据，世界上约有 20% 的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80% 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一空或遭到破坏，1/4 的哺乳动物濒临灭绝，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则比 20 世纪 50 年代增加了 3 倍。这份有 850 人参与、历时两年半完成的报告指出，人口和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要超过管理和技术的进步所取得的成果。人类可用来防止环境灾难发生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其三，发展的社会性结构失衡问题也日益严重。现代文明所导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之所以成为全球性问题，不仅是由于工业生产力的技术要素具有无限扩展的功能，而且在于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由一种以利润的追逐为发展动力的社会机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在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中，经济效益被置于社会效益之上，发展的不平衡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维持发展动力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发展机制一方面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把不平衡的发展扩散到全球。不平衡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自然系统的失衡，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系统的失衡。就后者而言，作为全球性问题，世界局部地区的过度发展与大部分地区的发展不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虽然世界经济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却在拉大。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目前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已接近15亿，这个数字比15年前增加了3亿，如果不改变既有的结构失衡状态，那么到2015年，绝对贫困人口将会增加到19亿。如同自然系统的失衡会使人类的生存陷入困境，社会系统的失衡也会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危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结构性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全球性的结构失衡所导致的贫困是引发国际争端和跨国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原因，并最终将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在当代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包含着与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密切相关的双重因素。如人口问题，它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提供了人口增长的更好条件的结果，同时又是贫困地区以出生人口的数量来应付恶劣的生存环境的结果。于是，人口问题就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地区的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贫困地区的高出生率，这两种趋势的结合，使人口总量的膨胀难以遏制，并使人口的增量部分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积累。再如环境问题，工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首先从发达地区开始，当这方面的后果显化后，发达地区往往采取两手政策，在本地区重视环境保护，而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这样既满足了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愿望，又不放弃对高额利润的追求。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发展首先着眼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实际的利益驱动使环境保护只能被置于次要地位。此外，发达地区的消费

方式在消耗自然资源上开创的负面效应随着大众消费的全球化而被扩散和放大，也进一步加剧了环境的退化。所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在目前的社会结构条件下不可能得到全球性的治理，人们尽管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源，也举行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发表了代表人类共识的世界宣言（其中最具影响的是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全球首脑会议所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以及在《21 世纪议程》的总框架下制定的一系列公约性文件），然而，实际的全球性治理环境运动至今没有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虽然局部的环境保护有所成效，但总体上人类的生存环境继续在恶化。

总之 进入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既充满了发展的机遇和希望，也面临着诸多全球问题的挑战，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推进到全球化阶段的反映，也是人类登上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后必然要作出的选择。当前，人类社会在选择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机制时所要解决的最具普遍意义的两个问题是：1. 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实现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的重构，为现代社会的全球性整合奠定合理的基础。2. 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时，如何超越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机制，矫正现代文明的偏失，为走出发展困境，突破发展极限而寻求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也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新世纪历史进程中的拓展和深化。

§ 2 新世纪历史教育面临的课题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充满着创新需求的发展环境，也是一个人们的智力活动达到空前高度的文明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人们自身的素质。无论从日趋激烈的国力竞争的角度看，还是从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发展方式的选择着眼，人的素质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人的素质即人的发展程度，它包含智力因素、情感因素和文化因素等，作为人的素质的客观尺度，则主要表现在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及人的社会实践能力上。人的素质的形成既有先天的成分，更多地则是依赖后天的教育，这是一个终身学习和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素质的培养过程，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本义所在。当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发展环境、不同的社会体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素质教育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要求；即使在相同的时代条件和发展环境中，作为各种具体的教育过程，对人的素质的培养也各有侧重。但是，以往的各种教育在面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所要求的人的素质时，都暴露出种种缺陷和不适应之处，所以，教育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遍及全球的浪潮，改革的取向即是形成以培养 21 世纪新人为目标的素质教育新体制和新机制。其中，创新素质的培养更是被各国的教育改革视为重中之重。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改革方针也明确表达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指导思想。

1999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 21 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 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

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1 世纪教育改革总体取向已经明确的大背景下，历史教育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清楚的，这就是为新世纪的素质教育提供更多更好的历史教育资源，使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歷史思维能力在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通过具体的改革途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新世纪历史教育面临的基本课题。

无庸讳言，当前历史教育的现状与培养 21 世纪新人的要求之间尚存在很大距离。主要的问题是：1. 教育目标的偏颇。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在素质教育中起着人格养成和文化熏陶的基础性作用，历史知识的传授是围绕这一基本功能进行的。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在教育的主导倾向上朝应试教育偏移，历史教育本来具有的素质教育特征逐渐淡化，而作为升学考试科目之一的工具色彩越来越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围绕着考试指挥棒转。在这样的功利目标驱使下，历史教育的人文性不仅很难张扬，而且被严重遮蔽了。与此同时，由于片面理解历史教育承担的政治教育功能，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教育的工具性，这在课程体系设置和教材知识点的选择以及教学大纲的制定上表现得十分明显。2. 教育功能的缺失。由于功利性目标替代了素质教育目标，学科的工具性替代了人文性，历史教育的功能缺失难以避免。本来，历史知识的学习是为了形成历史观念和歷史思维能力，但在应试训练中，历史知识的记忆被引向某一个标准答案或某一种固定的思维套路，因此丧失了历史学习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显而易见，按照标准答案训练出来的学生即使能在考试中得高分，却未必能正确地理解客观的历史进程，更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历史思维能力去应对现实的挑战，这样的历史教育失去了素质教育的功能，其本质被异化了。

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育体制的因素，也有教育理念的因素。如果说，体制的因素须依靠教育改革的总体性突破才能解决，那么，理念的因素除了教育观念的总体性变革，作为历史教育本身也需要对传统和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从把握人类社会发

趋势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高度对新世纪历史教育的发展前景作出前瞻性的展望，为历史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思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理念的更新乃是破解新世纪历史教育面临课题的出发点和首要环节。

新世纪伊始，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教育改革浪潮澎湃，历史教育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变革中的历史教育，需要客观地回顾学科发展的历史，需要冷静地分析现状与问题，需要敏锐地借鉴教育改革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理念的突破和体系的创新将使新世纪的历史教育展现勃勃生机。我们对历史教育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在改革中前进的历史教育将为 21 世纪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注 释

[1]“新经济”作为一个特指概念的提法最早见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 年 12 月 30 日发表的一组文章。

第 1 章

历史教育的历史回顾

§ 1 历史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

1.1 中外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1.1.1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进行史事记载的国家之一。迄今为止，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史事记载见于商代的甲骨卜辞。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起，我国已有按年记载的编年史。至迟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用来以记载军国大事，并形成了各国的编年史书。如晋之《乘》、郑之《志》、鲁之《春秋》、秦之《秦记》、楚之《梲杌》等等。其中以鲁国的《春秋》最为著名。《春秋》记事凡 242 年，以鲁国史事为主，旁及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事。《春秋》记事已经包含了人物、地点、时间和事件四大史学要素，记载虽极简略，但寓意褒贬，体现了记载者一定的意识和目的。稍后的《左传》取材广阔叙事详尽，体例上年经事纬，既遵守年月日编排顺序，又注意史事的本末原委，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

秦并六国，置郡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然而，强秦仅二世而亡，至西汉大一统国家才得到巩固，并逐渐走向强盛和繁荣。剧烈的社会动荡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思考，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引来了西汉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高潮。西汉的史学发展，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之家，从小刻苦好学，成年后游历天下名山大川，寻访历史旧闻遗迹。父亲司马谈，为西汉太史令，立志要写出一部史书，可惜未能完成，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其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事业。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以父亲遗稿为基础，历数十年寒暑，终于完成了这一部50余万字的史学巨著。《史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作者生活的西汉武帝时代，前后叙事三千多年，是中国第一部通贯古今的通史著述。作者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记事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物活动自天子、诸侯及游侠、屠夫；“天下遗闻旧事靡不毕集”。作者发凡起例，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全书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其中本纪用来记叙帝王的言行政迹；表用来谱列重大事件；书用来记载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世家专记各诸侯国的兴衰；列传记叙各种历史人物及其活动。纪传体的编撰方式，既突出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情况，又能记载各种复杂的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成为后代史家修史体例上的典范。《史记》语言生动，叙事精彩，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古代史学的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东汉班固的《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专记汉一代的史事，作者沿用《史记》的体裁，又加以整齐规范。《汉书》记载系统完备，规模范围宏大，其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天文历法、学术典籍、山川地理、行政区划、水利设施、风土人情以及边疆内外各民族历史等都有详尽的记载，为后来的断代史编撰提供了范例。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割据，朝代更迭频繁，统治者特别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以保持其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官私史学遂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其时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著的数量大为增加。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两汉晋南北朝的史书有 817 种、13 264 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此时完成的。这一时期的史书，体例门类有所扩大，分纪传、编年、实录、谱牒、史评、地理、方志、起居注、史注、史考、史钞等体裁。在学术分类上，史学著述原属经部的附属，此时则分经、子、史、集四部，史学已逐渐脱离经学，而成一个独立的门类。此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范曄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袁宏的《后汉纪》等。

唐宋时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在唐代，设馆修史成为制度，由此促进了史书编撰的大发展，成书于此时、后被列入正史的纪传体史书就有八部，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此时还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的史学著述，如唐代刘知几的《史通》，研究史书编撰的体例和方法，论述史馆建置沿革、史书源流，评述史家的素养和成败得失，是历史上第一部以批判精神写成的史学理论著述。唐代杜佑历时三十余年，撰写《通典》二百卷，综合历代史志中的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将它们重新分门别类，会通贯穿，详细地叙述其沿革变迁。此外，还有属地理总志的《元和郡县图志》、属谱牒类的《元和姓纂》、属编年体起居注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等，这些著作对后代的历史编撰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代的史学名著极多，如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都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宋代也是史著体例大创新的时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著作，该书的编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为一书，供君主阅览，从中鉴戒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它是“网罗宏富，体大思精，